

香港大學學生會 政治及公共行政學會 公開論壇

「象牙塔中的寒蟬——談香港學術自由的現況與未來」

2012年4月2日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 鍾庭耀 發言初擬

註：此乃初稿，正式發言時可能會有更改動。

各位嘉賓、各位同學：

三個星期前，即2012年3月12日，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邀請本人參加會議，討論「大學學術自由」。本人於是草擬了一份發言稿，準備在當天宣讀。可惜，本人當天只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所以原稿只能呈交備案了事。今天，同學又在校園討論「學術自由」的問題，本人於是把3月12日的發言稿，略為整理再次宣讀。

回顧近月發生的事情，社會上最新一輪關於「學術自由」的討論，觸發點應該是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針對本人主理有關香港人身份認同感調查的批評。所以，本人今天的發言就從有關調查說起。

綜觀郝部長自去年底開始的多次評論，和大約90多篇左翼評論文章對本人的攻擊，在撇除沒有學術價值的政治語言後，批評大概有三個論點：

- (1) 民意調查要求市民選擇認同「香港人」或「中國人」是不科學和不合邏輯。
- (2) 有關調查在香港回歸前進行是合乎「科學」原則，回歸後就變成「不科學」。
- (3) 調查鼓吹港獨，別有用心。

對於以上三點批評，本人有六點回應：

- (1) 很多調查，包括回歸週年調查，問卷會問：「你心情如何？」答案可以包括「開心、興奮、憂慮、害怕、矛盾、複雜」……等等。問卷無論是只選一項，或者可選多項，答案選項往往都是互相重疊甚至互相矛盾。亦即是說：被訪者可以同時擁有多種重疊和複雜的心情，只要講出最主要的一種或幾種感覺，研究便可以作出深層分析。又例如，調查會問「你認為政府最應該處理甚麼問題？」答案通常包括「經濟問題、勞工問題」……等等。不過，勞工問題其實可以算是眾多經濟發展問題其中之一，亦即勞工問題理屬經濟問題，經濟問題包含勞工問題，但只要兩者的實指定義不同，便有分析意義。因此，要求市民在「香港人」、「中國的香港人」、「中國人」、和「香港的中國人」四個重疊意識中選取最合適的身份代表，雖有「理屬和包含」的問題，但卻無不妥。問卷題目不是數學邏輯題，而是市民複雜心情的探熱針，是社會科學研究工具之一。
- (2) 退後十步，就算以上「香港人」對比「中國人」的問卷題目真有不妥，我們去年底公佈市民對「香港人」身分認同感升至10年新高，及對「中國人」身分認同感跌至12年新低，其實完全不是建基於上述問卷題目，反而是出於迄今為止連左翼評論人士都不敢挑戰的兩條獨立題目。有關題目分別要求市民以0-10分獨立評價他們對香港人身分的認同程度，和對中國人身分的認同程度。這些單項題目，完全沒有郝鐵川提及的「邏輯性」問題。郝鐵川部長，以至不同陣營的學者專家，根本就沒有細讀我們的調查，和我們多次發表的新聞公報，這是一個極不嚴謹的討論。
- (3) 在科學研究的領域，不可能出現主權回歸前就是「科學」，回歸後就「不科學」的改變。科學方法是一個嚴謹的探索過程，充其量可以說某某調查沒有參考價值，不能說調查方法的「科學」和「邏輯」性會隨著政治氣候改變。持這種論點的人，若非對科學方法認識不足，就是要把政治利益凌架於科學精神之上。

- (4) 同樣道理，如果上述調查方法在香港「不科學」，則同類身份調查在甚麼地方都不會變得「科學」。我們要問：台灣社會經常進行的「台灣人」對比「中國人」身份認同研究，在海外華人社會進行的「中國人」身份認同研究，以及近來常常討論美國 NBA 籃球員林書豪是「台灣人」、「中國人」、「內地人」、「外省人」、還是「美籍華人」的討論，是不是全部「不合邏輯」和「不科學」？為什麼郝部長沒有口誅筆伐？是不是「美籍華人」就不算「中國人」？本人認為，以「政治正確」凌駕「科學精神」，只會在極權社會出現。香港要保持自由開放，就一定要堅守我們的核心價值。
- (5) 至於調查的參考價值，只要我們看看近期香港與內地人在生活文化上出現的衝突，再仔細看看我們的調查結果，尤其是「八十後」年青人對「中國人」身分認同感在過去三年急劇下跌的現象，便可知道有關調查的預警作用。有關調查採用了13條意見題目，另加9個人口變項，是一個非常全面和有用的研究。郝部長拿出一條所謂「不合邏輯」的題目，去否定整個包含22條題目，跨越 15 年的調查，是不是比較武斷？
- (6) 最後，關於調查別有用心的批評，本來就不值一談。不過，左翼人士誣捏本人曾經與外國特務頭子會面，接受政治黑金，都是無中生有的抹黑。至於謾罵本人假借學術研究分裂國土，悖逆學術倫理與道德的指摘，就是直接詆諆我們的研究成果。對於上述莫須有的罪名和文革式的批判，本人當然可以一笑置之，但對於不少同事和年青學者來說，就是白色恐怖，學術機構應該正視，甚至考慮給予無辜學者適當的法律保護。

郝鐵川先生在本年 1 月 27 日撰文指出，「某些機構 10 多年來的民調活動」，都是為特定政團利益服務，早已遠離了「學術研究」的範疇。郝先生身為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這番說話對任何一個學術機構都是極之嚴重的指控，已經超出學術討論的範圍，份量不亞於數十篇左翼評論人士文革式的批判文章。由於課題涉及「學術研究」，學術機構都應正視。

在同一篇文章，郝部長又把「公共知識分子」和「學者」區分，認為純粹「主觀上只想影響學術界，而不想影響社會」的才算「學者」，郝部長的觀點屬於「非黑即白」的泛二元論，似乎是說「公共知識分子」無須得到學術自由的保障。

就著郝部長的言論，本人蒐集了本地各大專院校的校訓，發現差不多所有校訓，例如「明德格物」、「博文約禮」、「敬業樂群」、「敦仁博物」等等，都包含了追求真理和承擔責任的概念，與郝部長對「學者」的認知相去很遠。況且，香港各大專院校都在全力推行「知識交流」(Knowledge Exchange) 和「知識轉移」(Knowledge Transfer) 計劃，而包括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教育學、管理學、新聞學等等的社會科學，對「社會參與」的訴求尤為熱切。

本人認為，只要是熱愛真理，真心從事開發和傳遞知識工作的人士，不論是否在大學工作，不論是否擁有終身教席，都有資格享受學術自由。教育界同工、專上學生、研究助理等等，亦應作如是觀。

當然，「學術自由」與「院校自主」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但觀乎香港專上學界近十多年來的發展，情況實在令人憂慮。學術機構開始重視排名，把大量資源投放到形象工程和互相競爭方面，本末倒置。認真討論學術自由、大學傳統和知識分子責任的活動，可謂寥寥無幾。

以本人專注的民意研究為例，各間大學其實應該合力制定民意研究的專業操守，設立民意研究的專業課程，徹底解決時不時出現的「民調事件」。可惜，院校之間都是各自為政，各據山頭，爭取曝光。校內的管理階層，包括主理研究操守的委員會，都是傾向程序主導，缺乏為國家民族建基立業的胸襟。

一言以蔽之，香港各間大學都在北望神州，爭取發展。可幸的是，我們的大學仍然沒有黨委書記，大學校長基本上沒有接受政治任命。因此，北望神州，未嘗不可。只不過，當我們望向北方的同時，也不要忘記放眼四方，看看香港的定位和使命。當然，最好能夠時常仰望蒼天，再撫心自問：大學為什麼要存在？